

持节不惧 勇者不惧

“勇者不惧。”孔子把不惧作为君子之勇的首要品格。不惧,即遇到困难、危险时所表现出的不畏惧、不慌乱、不怯懦。

直隶容城(今河北容城)人杨继盛自幼读书,通过科举考中进士,是个典型的书生,但他却以胆色和勇气在历史上闻名。

嘉靖三十二年(1553),杨继盛上《请诛贼臣疏》弹劾严嵩,历数其“五奸十大罪”。在当时,严嵩是嘉靖帝朱厚熜最为宠信的权臣,把持朝政二十余年,真正的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杨继盛在上疏前特地斋戒三日,因为他知道上疏的后果就是一死,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。

果然,朱厚熜看罢奏疏大怒,下旨将杨继盛廷杖一百。廷杖最初起源于东汉,通俗点说就是用水板子打屁股。如果实心打,八十廷杖足以将人打死。廷杖前,有好友给杨继盛送去一副蛇胆,嘱咐他用烈酒服之,说:“用此物可以止痛。”杨继盛笑着回答说:“椒山自有胆,何蛇胆为?”杨继盛字叔山,意思是说,我自己有胆,何需蛇胆呢?

廷杖后,杨继盛“两腿肿相,摩若一,不能前后;肿硬若木,不能屈伸。止手扶两人,用力努挣,足不覆地而行入狱”。狱狱中潮湿阴暗,虫鼠横行,环境极为恶劣,杨继盛的伤口感染得十分严重,他决定自己动手刮去腐肉。没有止痛的药剂,也没有刀具可用,杨继盛只是喊来了看守,让其帮忙点一盏灯,然后摔碎了自己吃饭用的碗,拿着一块碎片,一点一点地去刮腿上的腐肉。肉被刮尽,筋挂膜,他又用手截去。为他持灯的狱卒颤抖欲坠,杨继盛却神色自若。虽是一介书生,杨继盛却是真正的硬汉,刮骨疗毒的关羽在他面前也只能自叹弗如。

三年后,杨继盛英勇赴死,死时年仅40岁。在狱中,他曾自撰挽联:“铁肩担道义,辣手著文章。”这份信念,是比蛇胆更令他无畏的内在动力。

唐初诗人骆宾王在《萤火赋》中说,“临危不惧,勇也”,他所称道的就是像杨继盛这样的人。明知道是怎样的一种结果,但面对酷刑、死亡,坦然地迎接,杨继盛勇气的背后,是他对正道的信仰,对节操的恪守。正如贾谊在《新书·道术》中所说:“持节不惧,谓之勇。”也就是说,面对正义能够挺身而出,面对气节能够义无反顾,那才是真正的勇敢,即君子之勇。

君子的勇气是建立在正确的非观念基础上的,《论语集注》里认为“义以为尚,则其勇也大矣”,勇的最终目的是归于正义,归于高尚。所以志士仁人的临危不惧,不是胆大妄为、肆无忌惮,而是明辨是非、坚守底线,为了正义的事业而甘愿抛头颅、洒热血,这才是君子之勇的深层内涵。

知所不为 勇而有礼

在儒家的观念里,血气之勇不仅不值得推崇,而且也是君子需要戒惧、警醒和超越的。君子崇尚“勇而有礼”,因为“礼”所表达的,是一种敬畏之心。

狼贖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员勇将,在秦晋之战中因战功卓著,被晋襄公任命为王驾的车右。春秋时以兵车作战,君王或主帅的指挥

君子之勇

仁人志士追求的天下达德

王爱军

在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德行中,“勇”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品德。《礼记·中庸》中称“知、仁、勇三者,天下之达德也”,意思是说,智、仁、勇这三种品德,是道德的至高境界。

“勇”有匹夫之勇与君子之勇之分,一言不合,拳脚相加,是匹夫之勇,这种勇浪多人都能做到,只要有几分血性和力气,在情绪的支配下,都可能爆发出来,但这种勇所争的不过是一时意气,所求的不过是一己私利。君子之勇则不然,它是孟子“道之所在,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英勇无畏,是苏东坡所说的“其所挟也,其所致也远”的使命担当,是鲁迅所言的“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”的心怀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。没有勇的品格的加持,仁的善念不可能得到结果,智的筹划也不过虚幻如烟,在所有品德的修炼中,它是真正的带刀护卫。

车上,主帅居中自掌旗鼓,左边为御者,负责驾车,车右则选取勇力之士,执干戈以御敌,即负责搏杀战斗。古人以右为上,地位仅次于主帅,所以作为车右是一件极为荣光之事。

同年,在晋国与狄国的箕之战中,先轸作为主帅,但他废掉了狼贖而换上了狐鞫(也称简伯)担任车右之职。狼贖大怒,因为这让他很没面子。他的朋友问他:“受到如此侮辱,为什么不去杀掉先轸?”狼贖回答说:“现在不是时候。”朋友以为是为没帮他,于是说:“我跟你一起。”狼贖说:“《周志》有这样的话,依仗勇猛,以下犯上,死后进不了明堂,得不到供奉。如果牺牲了却不符合正义之道,这算不得勇敢,只有为国牺牲才算是真正的勇敢。我因为勇猛而被提拔为车右,今天又被中军将认为不勇猛而撤除了职位,也是理所当然的,这是主帅不了解我啊,咱们姑且走着看吧!”

到达彭衙,两军列阵,狼贖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撤职而有所懈怠,战鼓一响,他立刻率自己的属下向前冲锋,在敌人的军阵中左冲右突,打乱了敌人的布阵,晋军随后掩杀,大败敌军,狼贖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。战争结束后,狼贖被追封为大将军。

勇不是随心所欲,而是有所克制。就像狼贖,无故遭到免职不生二心,遇征战无惧一死,勇而有礼,勇不犯上,这才是君子所为。孔子曾跟弟子讨论勇的问题,子路问:“君子尚勇乎?”子曰: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,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在孔子看来,君子崇尚勇敢是有条件的,即以义为准绳,君子有勇义就会作乱,小人有勇义就会去做盗贼。子贡又问孔子:“君子亦有恶乎?”孔子列举了几种令人憎恶的行为,其中就包括“勇而无礼者”,即勇敢但却不知道受礼的约束。勇而有礼,说明君子之勇并非自大狂妄,而是有所敬畏,知所不为。

不折不挠 勇毅前行

《管子·水地》里说,“折而不挠,勇也”,意思是说,人在遭遇挫折或困难时,能够不屈不挠,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,这才是真正勇敢的表现。

天汉二年(前99年),汉代著名飞将军李广的孙子骑都尉李陵,率五千步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,在淩稽山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,接战数十日,杀敌万余,最终弹尽粮绝,被迫投降。群臣无人敢为李陵说话,只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仗义辩解说,李陵以五千步兵与匈奴主力交战,杀敌一万多,虽然战败降敌,其功可以抵过。

汉武帝大怒,司马迁以诬陷罪名被逮捕下狱,按律当斩。汉朝的法律,一个死刑犯要活命,要么拿钱赎买,要么接受宫刑。司马迁家境贫困,无钱可拿,而作为一个讲究气节的士大夫,宫刑是极大的羞辱。但在司马迁看来,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,他最终选择了屈辱的宫刑,不是因为贪生怕死,而是他还背负着神圣的使命,那就是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像孔子修《春秋》那样续写历史。

在《报任安书》中,司马迁袒露了自己的心迹:“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,怯懦的人如果仰慕大义,什么地方不可以勉励自己去死呢?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,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,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,平平庸庸地死了,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。”

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,司马迁忍辱含垢,奋发图强,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《史记》的创作中去。历经14年的艰苦努力,长达52万余字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诞生了,司马迁

是多么雄伟、壮观的神奇景象。

起来,受人污辱咒骂的!起来,天下饥寒的奴隶!满腔热血沸腾,拼死一战决矣。旧世界破坏得彻底,新社会创造得光华。莫道我们一钱不值,从今天普有天下。这就是我们阶级最后的决死斗争,同英德纳雄纳尔,人类方得复兴!这就是我们阶级最后的决死斗争,同英德纳雄纳尔,人类方得复兴!

不论是英雄豪杰,不论是天皇老帝,谁也解放不得我们,只靠我们自己。要扫净万重的压迫,争取自己的权利。趁这洪炉火热,正好发愤锤砺。(副歌同前,略)

只有伟大的劳动军,只有我世界的劳工,有这权利享用大地;那里容得寄生虫。霹雳惊雷震撼,残暴贼天逆销声。看那光华万丈,照耀我红日一轮。(副歌同前,略)

瞿秋白翻译的《国际歌》歌词,虽然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太相同,但其精神内核却高度一致。不久,瞿秋白将翻译好的《国际歌》歌词连同简谱,发表在1923年6月15日《新青年》复刊第一期上。这是《国际歌》在我国最早“词谱合一”且能传唱的中文版本,它的刊发,作为不朽的无产阶级战歌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唱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这一年,瞿秋白24岁。

此后,瞿秋白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,负责起草党纲草案,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;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,负责中共宣传工作,担任中央机关刊物《新青年》《前锋》的主编和《向导》的编辑。

1923年6月20日,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的当天,与会代表齐聚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,在瞿秋白的指挥下,高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《国际歌》,这是《国际歌》首次在中共党代会闭幕式上被引吭高歌,雄壮有力的歌声,激励着革命志士勇往直前,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。从此,在党代会胜利闭幕时高唱《国际歌》,成为传统,一直延续至今。

1935年6月18日清晨,福建长汀罗汉岭下,36岁的瞿秋白神色自若,坦然走向刑场,从容地哼唱起《国际歌》,在歌声中慷慨就义,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歌词中伟大的斗争精神。

临事屡断 有勇有谋

《礼记·乐记》里说,“临事而屡断,勇也”,意思是说,面对危机或复杂的事物时,能够审慎而果断地做出决策,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。

长寿元年(692),地官尚书兼宰相狄仁杰遭酷吏来俊臣的诬陷,被逮捕入狱。后来俊臣没想到的是,还没等施用酷刑,狄仁杰就痛快承认了谋反的罪名:“大周朝革命,万事维新,唐室的旧臣,甘愿听从诛杀,反叛是事实。”来俊臣由此放下心来,只是把狄仁杰关在监狱里,等候问斩,没有再为难他。

谋反的事当然子虚乌有,狄仁杰之所以认罪是因为来俊臣是个极其严酷的人,他只一句“请君入瓮”就让酷吏周兴认罪伏诛。他还曾写过一本《罗织经》,专门讲如何编织罪名,不管是谁只要到了他手里,用他的同伙王弘义的话说“谓人者例皆尽也”,进入这里就没有人可以活着出去。如果狄仁杰不认罪,可能没等审判就死在了酷刑之下,做个宁死不屈的忠臣容易,但却可能失去了为自己申冤的机会。

判官王德寿见狄仁杰很配合,便找到他说:“我意欲少迁,公为我引物执柔为党,公且免死。”意思是说,我想得到升迁,只要你能够供认地官尚书执柔是同党,我就可以设法为你开脱,免去你的死罪。自己认罪行,但出卖他人以求生是万万不行的,狄仁杰悲愤地说:“皇天后土,使仁杰为此乎!”当即以头撞柱,血流满面,把王德寿吓得匆忙而逃。

狄仁杰借来俊臣等对他放松警惕之机,偷偷写下了一封申诉书藏在棉衣里,转交给了家人。他的儿子狄光远拿着这封申诉书去找武则天鸣冤。武则天觉得事有蹊跷,亲自召见了狄仁杰,当面质问他:“你没有谋反为什么要承认呢?”狄仁杰答道:“要是不承认谋反,早就死在来俊臣的鞭笞之下了。”狄仁杰由此保住了一条性命,仅被贬为彭泽县令,很快便东山再起。

从狄仁杰身上可以看出,勇不仅是丝毫不惧这么简单,而是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,果断取舍,做出正确的决策。鲁迅先生曾经说,“无谋之勇非真勇”,缺乏谋略和智慧勇气并不是真正的勇气。君子之勇意味着,当面临突然降临的危难时,既不盲目地逃跑,也不盲目地冲进危险,而是保持镇定,冷静地权衡面临的境遇,通过深思熟虑,断然做出是进是退的决定。

所以,真正的勇敢是理性智慧下的一种道德行为,它不仅包含了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决心和行动力,更包含着深思熟虑、善于策划的智慧。正如荀子所说:“兼权之,孰计之,然后定其欲取舍。”这句话也提醒我们,在做出决策和选择时,要保持理性和冷静,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或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。

勇敢绝不是莽撞行事,而是用理性的思维和判断来指导自己的行动,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和坚定。有智慧勇气才能算作真勇气,有勇气的智慧才能算作真智慧,智勇兼备,才是君子之勇完美的体现。

罗翔教授曾经说:“在人类所有的美德中,勇敢是最稀缺的。”勇敢之所以稀缺,是因为它需要一个人克服所有阻碍他的东西。这些东西,可能是强权与暴力的威胁,可能是懦弱与恐惧的心理,也可能是财富与名誉的诱惑。正义需要勇气,抗争需要勇气,放弃也需要勇气。正因为其稀缺,所以君子之勇成为仁人志士古往今来所矢志追求的天下达德。

瞿秋白翻译《国际歌》

周惠斌



1923年,《新青年》复刊第一期刊载《国际歌》译词和曲谱

祖国,寄住在堂兄瞿纯白位于北京东城区大羊宜宾胡同的家中。回想起在苏俄的经历,他想到首要之事就是把激昂雄壮、振奋人心的《国际歌》——那首让他无数次为之热血沸腾、激动不已的神圣战歌,翻译介绍给中国大众,使之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信仰之源。

《国际歌》是法国诗人欧仁·鲍狄埃在巴黎公社失败后,于1871年6月写成的诗作。17年后,也即1888年,由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·狄盖特谱曲。当时,《国际歌》在中国已有3种译文:一是1920年10月,署名列悲翻译的《劳动歌》,发表在《劳动歌》;二是同年11月,张逸狱翻译的《劳动国际歌》,发表在《华工旬刊》;三是1921年9月,耿济之、郑振铎翻译的《第三国际党的颂歌》,发表在《小说月报》。由于它们译文晦涩,且都没有附曲,因而没有传唱开来。

瞿秋白先是根据法文原版《国际歌》进行翻译,然后将它与俄译本《国际歌》进行对照。他一遍遍斟酌原文,一句一句地将歌词译成中文,又找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。1923年初,瞿秋白回到阔别两年的

直到翻译得顺口易唱令自己满意为止。

当译到《国际歌》最后一句中的法文单词“Internationale”时,原本该词的中文意思是“国际或国际主义”,只有两个或四个字,然而《国际歌》中对应的音节却比较长,有八拍,在音律上很不顺口,也不悦耳,更难以唱好。瞿秋白再三琢磨后灵机一动,将法文“国际”一词,音译为“英德纳雄纳尔”(后传为“英特纳雄耐尔”)。他疾步回到琴边,伴着清晰的琴声和有利的节奏,用激昂的声音唱出了“英德纳雄纳尔,人类方得复兴……”

最终,瞿秋白采用音译的办法,将歌词和歌曲完美、和谐地融为一体,解决了中、外文歌词与音节不匹配的问题。后来,瞿秋白曾告诉朋友:“国际”一词,在西方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,现在汉语用了音译,不但能唱了,更重要的是唱的时候可以和各国的发音一致,可以收到中国劳动人民与全世界的劳动者“万众一心、情感交融”的效果。为此,他在《译者志》中阐述道:“各国都有译本,而歌时则声调相同,真是异语同声,世界大同的兆象。”也就是说,世界各国的无产者虽然肤色不同,语言有别,但当他们唱出“英德纳雄纳尔”时,万众同声,此起彼伏,远近共鸣,那

“上乘”原指四马共驾一车

许晖

今天把上品、上等称作“上乘”,比如“上乘佳作”指最上等的好作品;相应的,下品、下等称作“下乘”,比如“落入下乘”指落入最下等。此处“乘”的读音同“成”音,但是在古代,“上乘”的“乘”读音同“圣”音,而且含义跟今天完全不同。

《左传·哀公十七年》载:“十七年春,卫侯为虎幄于藉圃,成,求令名者,而与之始食焉。天子使宰以退,数之以三罪而杀之。”

虎幄,以虎纹为饰的帐幕;藉圃,园圃之名;令名,好名声;天子,太子;良夫,即浑良夫,本为卫国大夫孔文子的仆人,长得英俊漂亮,曾协助卫庄公发动政变登上王位;袒裘,袒露开皮衣,按照礼制,裘上要加褊衣,褊衣上再加朝服,脱掉衣服的时候,只能袒露出褊衣,浑良夫吃饭吃得热了,居然在卫侯面前袒露出裘,这是越礼之举。

至于“衷甸两牡”,“牡”指雄性的鸟兽,“两牡”就是两匹马;衷甸即“中乘”,两匹马拉的车子。孔颖达注解道:“以四马为上乘,两马为中乘。大事驾四,小事驾二,为等差故也。”意思是说:“上乘”为四马共驾一车,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所用;“中乘”为两马共驾一车,事情不重要时所用。

这一年春天,卫庄公在藉圃新造了一座饰以虎纹的大帐幕,

造成之后,要请一位名声好的人在里面吃第一顿饭,太子推荐了浑良夫。没想到乘坐“中乘”而来赴约的浑良夫居然连犯三罪:紫衣袒裘,穿只有国君才能穿的紫衣;袒裘;带剑而食。太子于是杀了他。

按照周代礼制,“天子之大夫皆驾四”,“上乘”因此引申为上等马,“中乘”自然就是中等马,“下乘”自然就是下等的劣马。《左传·哀公六年》载:“阳生驾而见南郭且于,曰:‘尝献马于季孙,不入于上乘,故又献此,请与子乘之。’”这是说公子阳生曾经献给季孙氏的马“不入于上乘”,没有列入季孙氏的上等马的行列。

辅佐朱元璋成就帝业的刘伯温所著《郁离子》一书中写道:“冀之北土纯色者为上乘,居天闲,以驾王之乘舆;其属为中乘,居内廐,以备乘舆之阙,戎事用之;冀及济河以北,居外廐,诸侯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。”“天闲”是专供皇帝乘马之地,“上乘”要养在这里,为皇帝驾车;“廐”指杂色,杂色的“中乘”要养在皇家内廐,作为“上乘”的替补;其余的马虽然也不一定就是“下乘”,但都要养在外廐。

如今“中乘”早已不用,“上乘”和“下乘”的义项即由此引申而来。